

# 我市艺术家创作战“疫”作品

**本报讯**（记者 王晨 文/图）为更好地弘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精神,增强社会各界战胜疫情的信心与斗志,自2月1日起,市美术馆向全市艺术家发出“抗击疫情,我们同在——周口市美术馆在行动”活动倡议,截至目前共有320名书画家参与其中,创作作品400余件。

在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无数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地站在抗疫最前沿。周口艺术家用作品展现了医护工作者主动请缨、救死扶伤、迎难而上的无畏与坚守。他们将主题选择在基层,通过艺术形式表达了对抗疫工作者的支持与赞扬。书

法、绘画、泥塑、篆刻、剪纸……320名书画家及艺术爱好者积极参与,用心中大爱创作出400余件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传播正能量、讴歌时代英雄的艺术作品,彰显了新时代艺术家们的使命与担当。

另外,市美术馆馆长李珂告诉记者,为丰富宅在家中的书法爱好者的学习生活,市美术馆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书画小课堂,陆续转载《翰墨中华》(18集)系列微电影,让市民学习了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18件优秀书法作品,解读名作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一场精美的艺术盛宴。②8



泥塑作品

## 周口老城商脉考

童建军



周口,一座因水而生、因商而荣的城市,“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熊廷弼《过周家口》)描述了他昔日的繁华,“又沿大沙河之左岸,至周家口,此一大商业市镇也”(孙中山《建国方略》)传递出他曾经的影响,在素以农业见长的传统平原农区,周口中心城市自形成之日始,就带上了深深的漕运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印记,书写着商旅奔驰通江达海的时代传奇。

一条河,两个集  
颍岐口,接千里  
三川汇,成化始  
千帆集,逐波兴  
百条街,十会馆  
讲诚信,义利行  
老字号,意隽永  
闹棚处,新芽萌  
老城厢上流光影  
新时代里看复兴  
——是为序。

**一条河,两个集**  
一条河即是沙颍河。沙颍河周口段在元代以前并未向东流,而是经周口新街口处折而向南又向东南流。据清朝大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元代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北汝水(又名沙河)经潞水由孙嘴口入颍,颍水不足以容乃开新河,所谓新河,就是周口至槐店的沙河。之后,颍水故道淤塞乃至被填,新河“转正”,名为沙颍河,实质上是周口以下颍水改道的一条人工河流。明朝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沙颍河北岸西老寨形成墟集(双日集),东西五里,南北两里,置永宁集地方,设乡里,分属商水县和陈州管轄。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沙颍河南子午街(今老街)设贸易市场子午集(单日集),与永宁集隔河相望。山西周姓移民在子午街北口开辟渡口,摆渡往来客商,称为周家渡口、周家埠口,周口由此而得名。

**颍岐口,接千里**  
据专家考证,颍岐口在今周口港区李埠口乡高山顶处(参见周建山《颍岐口地望考》)。明朝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辟中原水运,将大批粮食和军国物资从淮安起运,经淮河、沙河到达陈州的颍岐口脚踏下,换小船运至铁路上,另以大船载入黄水,至新乡八柳树等处,令河南车夫运赴卫河,转输北京。又据查证谭其骥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经颍岐口转运的一段很重要的衔接线路是走沙水(又称蔡水、小黄河)。于陈州境内的河线是:颍岐口(牛家口)、许家湾、指挥营、柳林集。也正是当地群众广为流传的老运粮河(参见乾隆《淮宁县志·河渠图》、刘占国《历史上周口运河的流向及航向》)。

**三川汇,成化始**  
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黄河在开封北面的仪滩湾决口,汴、蔡河流相淤塞,江淮漕路断绝。为了开通漕路并宣泄淤滞,工程尚书贾鲁主持

疏通汴河、蔡河,挽黄河向东南流,从今兰考县东流出,经曹县南、商丘北、砀山西、萧县北,至徐州入泗,由泗入淮。也就是说彼时的贾鲁河并不通过周口。明正统年间,(黄)河决蒙泽孙家渡。孙家渡河经朱仙镇至白家潭,进入扶沟县境。明成化中,知县李增“自吕家潭南张单口另疏新河,逶迤西南至县东北五里许张会桥,与双洎合流出境,绕西华三面,下至周家口入沙河,下达淮安”。“贾鲁河明成化年间始通周口”由此而来。弘治年间,都御史刘大夏等人再从孙家渡引黄河水东南流,由白潭入扶沟县,接东蔡河故道,至商水县汇颍水,称为贾鲁河。其实这条河并非贾鲁所开。但在此前,贾鲁曾主持疏浚过汴、蔡等河流,故后人统称为贾鲁河。

### 千帆集,逐波兴

贾鲁河道的疏浚使其恢复了水运功能,三川汇流,溯贾鲁河北上,可达朱仙镇,连通开封府,进而通达北京及北方各地。沿贾鲁河南下,向东南可达于江浙,向南可达于汉口。向西可沿沙颍河至豫西、陕陕。周围百余里的商贩亦多迁入,沿河三岸鼎足之势形成。明万历年间,航运又有发展,埠口逐渐增多,一些商贾大户开设粮食、杂货、茶麻、中药等商铺,商业贸易日渐繁荣,城市日渐兴旺,商贾云集,桅樯树密,周口成为淮河流域的物资集散中心。“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当时的大学士熊廷弼《过周家口》形象题诗(全诗待考)也成为了传诵至今的话。

明隆庆四年(1570年)黄山商人黄汴所著商书《一统路程图记》,辑录了当时全国主要商道的水陆交通路线,其中三条路引中有周家口的名字,这是目前所见周家口这个地名最早见于书籍的记载。三条路引分别是“颍州由前河至汴城水路”“颍州至襄城县、钧州水、陆路”“淮安由南河至汴城水路”。明天启六年(1626年)程春宇所著《士商类要》也是一部重要的商书,其中“清江浦(今淮安)由南河至汴梁水路”路引中记载了从淮安经周家口至禹州的水路行程,并提供了沙河上游的水路行程。由此可见,当时豫省境内以周口为中心,连接东西、贯通南北、辐射大半个中国的漕运和商运交通网络已然形成(参见岳霄《周家口水运线条》)。

### 百条街,十会馆

漕运的发达使周家口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清顺治年间,沿沙颍河先后开辟了大渡口、小渡口、上下齐埠口、新渡口,在沙颍河贾鲁河交汇处铸立镇水铁水牛。到了康熙初年,商水县设置24地方,永宁集位其地方之一,以后又新添了周家口。康熙九年陈州管粮州判治所由淮阳移至周家口,以统管全镇市面。雍正十二年升陈州为府,并添设粮捕水利通判驻扎周家口,周家口商务随之臻于鼎盛时期。清乾隆十二年的《商水县志》记载,周家口“国朝治平百年以来,人烟聚聚,街道纵横,延及淮宁境,连接永宁集,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舟

车辐辏,烟火万家,桅樯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藪。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

乾隆、道光年间是周家口商业最为繁华的时期。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已形成经营货场和生产品种分行就市的局面,两河三岸大小街道72条,加上背街、胡同116条,不少以行业命名。同时,在周家口定居的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商贾商帮分别募捐,兴建福建会馆、糖业会馆、覃怀会馆、江西会馆、江南会馆、两湖会馆、陆陈会馆、油业会馆、南岸山陕会馆、北岸山陕会馆等乡会馆,手工业捐资修建庙宇达50座。彼时的周家口街道纵横交错、会馆比肩争雄、商号林林总总、商业规模宏大,成了与朱仙镇、道口镇、赊旗镇齐名的河南四大名镇之一。

### 讲诚信,义利行

三川交汇,三条共营,使周口成为投资经商的风水宝地。全国各地的行商巨贾纷纷来周口投资兴业,较多的有山陕帮商人、怀庆帮商人、安徽帮商人和两湖帮商人等。他们在周口苦心经营、诚信经营、以义取利、发家致富,为周家口的繁荣昌盛及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自己融入周口进而成为周口的一份子。

周口关帝庙(山陕会馆)是周口诚信文化和商人义利观的集中体现。“秉烛持纲常顾影兮惭心上日,封金完节义对人不愧性中天”,这是周口关帝庙春秋阁前的一副楹联。周口关帝庙,这座曾经的山陕会馆,耗资巨大,历时159年建成,不仅印证了周口昔日商业的繁华,也是周口商业文化之魂的集中体现。对忠义关公的无限敬仰寄托了植根周口的商人们的不懈精神追求和道德信仰,声震灵霄,唱响诚信周口,“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精神理念贯穿于商人们的经营与管理之中,成为商家极力打造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周口的商业文化之魂。这一点在日常杂货交易中使用的“天、地、人、心”四种秤上也可以得到生动的印证。

### 老字号,意隽永

周家口商业最繁华时期的常住人口加上流动客商等人口急增至近20万人,商人商号达1500家~2000家,年经营规模估算为500万两~600万两白银。据周口山陕会馆道光十八年《重修关帝庙岁积厘金记》,其神阴佛有的捐资抽厘的行商就有320家,分属杂货、麻、油、丝、布、米、果、山货、骡行、皮行、药材行等行。这些老商号不仅勤于经营,而且字号典雅、意味隽永,比如新盛翔、龙兴歧、瑞龙西、交泰东、王盛和、乾顺公、世发康、生生茂等,不一而论。既寄托了商帮、商人祈望生意兴隆、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景,又传递出传统文化特有的气质和神韵,伴随着周家口名扬天下。

### 闹棚处,新芽萌

清朝中后期,海运逐渐取代河运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主要渠道。1843年,黄河在中牟决口,致使贾鲁河淤积,贾鲁河北上开封的航道被阻,自此再未恢复。周家口的商业开始走向萧条。咸丰同治年间,周口迭遭战乱,著名的山陕会馆“三次焚毁,几至于尽”。周口以西数十公里的漯河,因地处铁路沿线而吸引了大量商民,周口则“连年生意冷落”,商业渐趋式微。

尽管如此,老周家口的影响仍在,而且逐步向近代经济转型。手工业逐渐从家庭作坊式转变为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或工厂。近代商业和服务业新露端倪,商品的种类除传统的本国商品外,还有了洋灯、洋火、钟表、肥皂、煤油、石油等一些舶来品。大量的农副产品经过商行流向通商口岸,再由通商口岸经过洋行出口到海外市场。而大量的机制工业品则由通商口岸运至周口,再销往周边各地。周口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经营西货的商店,如洋布庄、自

行车行、西药房等。商业资本对生产活动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并且出现了商会、同业公会等近代商业组织。同时,一些近代服务业如照相馆、理发店、修表铺、菜馆、旅店等也纷纷出现。周家口金融业得到了充分发展,钱铺、钱庄、银号等传统银行和近代银行并存(传统银行主要集中在周口老街、近代银行主要集中在周口新街),并逐步向近代银行过渡,周家口发展成为“商工并茂的都市型大镇”。汽车公路修筑,近代邮电业兴起,创设了电报局,开办了国际邮政,设立了德化街邮局、磨盘街邮局等(参见杨光《近代周家口镇经济转型研究》)。

### 老城厢上流光影

1948年1月,周口市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周口商业历经公私兼顾、对私营和个体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所有制形式实行“升级过渡”、开放、关停、再到改革、开放、搞活的转换。曾几何时,凭本供应、凭票供应成为了一个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一间小屋、一个柜台、一个窗口,也是当时百货门市部的真实写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早已内化于周口人骨子里和血液里的商业文化因子再度被激活,国有、集体和个体私营商业“百花齐放”,百货大楼、人民商场、凤凰台市场、荷花市场等各领域风骚、各展风采、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派活跃、市场繁荣的商业图景。其中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荷花市场,当时是河南建立最早的商品批发市场之一,凭借位居市区的交通便利条件、人口众多的消费潜力及在豫东地区的唯一性,迅速在周口和豫东地区蹿红,商品辐射河南、河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和浙江等12个省的100多个县,在这里经商的不仅有周口当地人,还有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人。“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市场和“荷花市场现象”声名远扬,一度成为周口市的一张商业文化名片。

### 新时代里看复兴

光影流转,迭代更新。随着凤凰台市场的拆迁、人民商场的改头换面,特别是荷花市场的外迁等,周口商业也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建设周口华耀商贸物流城,以前瞻的规划、合理的布局吸纳商户和消费者,打造豫东南地区经营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经营商品链条最长、经营环境最优、辐射最广的超大规模综合商贸物流中心,努力建成立足中原、辐射全国的国际化、现代化的超大规模综合商贸物流城。

顺应大智移云等现代科技时代的变化,加快传统百货的业态转变和品质提升。引进和依托万达、建业、昌建、一峰等,建设大型现代商超和购物中心。引入品牌店、体验式购物、一站式消费等现代商业模式,带动周口商业系统性重构。

加强城市设计,挖掘历史文化,唤醒老城记忆,提升文化内涵,突出文脉传承、风貌保护、功能提升、产业发展,选点、连线、扩面,打造特色商业历史街区 and 文旅商融合精品,推进文旅商融合发展。

下大功夫推进多式联运和临港经济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扩大流通,促进就业和消费,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

……

周口老城,自明朝永宁集、周家渡开始,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建城史,独特的地理形制和历史发展,造就了其亲水、重商、尚义的自然禀赋和经济文化特质。600年来谁著史,在新的时代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继承延续和利用好周口水脉、商脉和文脉,呼唤周口商业文化复兴,重塑周口商业文化之魂,再造周口商业文化辉煌。在这样一个大好时代里,这个目的将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②8

### 三、帝心难测,太昊祠畔陨星斗

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植羽翼虽被剪除,但由于其威望甚高,兄长至死都未放下对曹植的戒惧之心,就连东征归来,亦着意绕道雍丘,驾临曹植处所,仔细相验,以安心结。而继位的新君侄儿萧规曹随,同样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特别是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发生的讹言“新君卒、群臣欲迎立曹植”之事,让曹植的处境更加不妙。《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是时伪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下太后群公皆惧。及帝还,皆私查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

流言猎猎,曹植危如累卵。新帝虽对此事暂不究问,但也难免不把他看作是危险之源而大加防范:“焦煎”变“缓煎”,曹植又被徙封浚仪,次年才得以复还雍丘。

然而,在其命悬一线之时,素负“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志向的曹植,雄视天下,甚为曹氏政权能否长久百年而忧思难眠:帝王“孤天下”,禁锢同姓诸侯而重用异姓大臣,遗患大兮!每虑至此,其作为新君的唯一嫡亲皇叔,忧心忡忡。为大魏王朝,曹植一改昔日尽力韬晦、以期自保的哀悯心志,毅然祈望新政初立,建功效国,遂上《求自试表》,慷慨陈言:“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冀望新君能舍得一个职位,使自己抱利器而有所施,为大魏建功、为王朝兴业。其心诚志坚,言辞激切,气势磅礴,足以感天地憾地。然而,曹植的一腔热血,却仅是一厢情愿。上表之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唯一改变的是,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植被徙封东阿,又要启程上路了。同时,当政者对藩国的限制和圈禁进一步加剧,曹植境遇尤其:

时法制,待藩国即自峻迫,僚属皆贵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曹植传》)

封地频更,作为新君的唯一嫡亲皇叔,曹植捍卫大魏王朝的责任丝毫未曾懈怠,其“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贲”的梦想与忧虑,再度被激发,企图建功立业,匡时济世。其持续“任性而行”“义在前,虽千万人吾往矣!”曹植再次上表,但方式已经转变,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曹植又上《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以称扬天地之德为始,接着盛赞“帝唐钦明之德”,颂美“文王翼翼之仁”,阐明皇帝与诸王之间应有的“骨肉之思”及“亲亲之义”,而后笔锋一转,窃望抱利器而有所施,言辞更加急切:

臣伏自惟省,岂无维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历经曹氏三朝的砥砺,曹植对朝野权术有着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他以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隐约地感知大魏王朝的隐患所在。特别是想起父王晚年病重之时,“夜梦三马同槽而食”,其隐忧愈重,彻夜难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安愈加令其焦虑。然而,身处绝境,曹植,曾饱受“鸱枭”“豺狼”和“苍蝇”之害,还有那虎视眈眈的“监国谒者”,都时时令其有夺命之虞,对朝中旺臣又岂敢再有指点之安?引火烧身,曹植畏惧,惟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而冀望执政者有所警醒: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偃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曹植《陈审举表》)

站在曹氏一脉的角度,曹植对“豪右执政”、异姓“当权”之事,可以说,有着极其犀利的谋略远见。(此后未过几年,曹魏王朝即为异姓所替代,他的焦虑与隐忧不幸言中)为规避隐患,曹植在上表中以死自忠自荐:

常愿得一奉朝覲,排金门,上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曹植《陈审举表》)

为“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曹植知难而上,愿披坚执锐,“一奉朝觐”“死不恨矣”。但可惜的是,大魏帝王历来关注的只是“公族之臣”有无覬觐之心,而对王朝图景向来自视甚高。因此,曹植的隐忧和牵挂,丝毫未引起主政者的侧目,仅仅获得“优文答报”,抚慰而已,其依旧是“圈牢之养物”。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二月,曹植被封为陈王。(陈,即陈国,周朝封为陈国,秦置陈郡。古人称水北为阳,因陈地在淮水之北,西汉改陈郡为淮阳)履任伊始,依照惯例,曹植分别作《改封陈王谢恩章》《谢表改封表》感谢帝恩。但是,此时的曹植每况愈下,早已没有了昔日雄姿英发的豪状,其面黄肌瘦,身体孱弱,就连新君见了也甚为震惊:“王颜色瘦弱何意邪……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曹睿《与陈王植手诏》)新君关切,曹植自然作表致谢:“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诏,愍臣瘦弱。”(曹植《答诏表》)不久,新君女儿亡故,曹植又应新君《诏陈王植》书,相继作《答诏示平原公主诰表》《平原懿公主诰表》。叔侄诏表往来,似是天气转暖、亲近相加,曹植渴求试用的初心再次被激发。时年九月,俯瞰国事,心意忧忧,曹植作《谏伐辽东表》,假以时谋,献计献策:

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劝农桑。三者既备,然后令伊管之臣得施其术,孙吴之将得备其力。若此……曹植何忧于二敌,何惧于公孙乎!今不聃于邦畿之内,而劳师于蛮貊之域,费为陛下不取也。

同时,曹植积极游说,希望面君。然而,他误判形势,满腔的热忱再次跌落谷底:

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曹植传》)

郁郁寡欢的曹植,杖藜扶藓,踏勘神农圣道,观瞻“五谷台”。曹植拾阶而上,依礼参拜,缅怀神农圣德,写下诗篇《神农赞》:

少典之胤,火德承木。

造为耒耜,导民播谷。

正为雅琴,以畅风俗。

循迹羲皇故都,来到太昊祠堂。曹植追忆羲皇圣迹,仰慕不禁,出得殿来,默然肃立,诵下先皇创世业绩的礼赞《伏羲赞》:

木德风姓,八卦创焉。

龙瑞官名,法地象天。

包厨祭祀,罢网渔畋。

琴瑟以象,时神通玄。

缅怀先祖,遥望京都,曹植“怅然绝望”,骥足不展,遗憾何极!每天汲汲无欢,“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资治通鉴第七十二卷》)这种极度绝望的凄凉心境,凝结成文字,在其晚年的《释愁文》中一显现,字字泣血,句句忧心:

予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焚。有玄虚先生见而问之,曰:“子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愁之为物,推德惟忧。不召自来,推之弗往。予之不知其际,握之以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其来也难追,其去也易追。临餐食困于哽咽,烦冤毒于酸鼻。加之以粉饰不泽,饮之以藁青不肥。温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骨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悦,乐之以丝竹增悲。医和绝思而无措……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四十一岁的曹植奄然归天。是夜,一颗赤色大星光芒闪耀,自西北流于东南方向,坠入太昊祠畔。

然而,曹植虽死,但他那位新君侄儿对皇叔的猜忌依旧没有放下,谥之曰“思”,要其在天之灵继续“追悔前过”。曹植走了,惊吓过度的家人,并未因曹植的离去而消除对当朝执政者的恐惧和隐忧,更担心当政者连他的尸体也不放过,于陈州城四门出殡,在城南三里立为四家,后人称之为“思陵冢”。惶恐未定,不久又取其梓棺辗转安布,“东阿鱼山”成为其疑冢之一。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思陵荒冢远离魏都,既无大型殉葬又无皇封,荒树枯木,蓬蒿满眼。明代诗人戴昕《思陵墓蒿》诗曰:

望入思陵墓蒿长,

天涯谁复见曹郎。

亭亭古树含春雨,

闪闪飞鸦背夕阳。

七步才名归寂寞,

一回尘梦合凄凉。

无端两眼怀人泪,

拭向东风漫举觞。②8(全文完)

## 望入思陵墓蒿长

耿险峰